

怅望千秋：杜甫的儒家思想及其践行

陈岸峰

[摘要]杜甫一直怀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诤臣与忠君的儒家思想均源自他早年被称作班固与扬雄及其自我期许的实践。其在左拾遗任上的直言诤谏与弃官而去，便是其骨鲠个性与政治依附性的冲突。其儒家理想人格与现实政治格格不入，即缺乏弹性，缺乏周旋的职场认知与技巧，而战乱时期并没有机会允许杜甫直谏的宽容政治氛围。然而，杜甫以“腐儒”自居及其坚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孤独感”，构成杜甫后期诗歌的一种独特的风格，亦是其成为中唐儒学复兴的先驱人物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杜甫；儒家思想；政治理想；腐儒；孤独感

[基金项目]202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盛世危言：杜甫与政治”(21FZW004)。

[作者简介]陈岸峰(1973—)，男，文学博士，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澳门 999078)。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大唐帝国的政治体制下，唐太宗李世民将儒学视为关系唐王朝生死存亡的根本，他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唐太宗参加名儒论坛，并颁行《五经定本》，结束了五经在解释上的混乱状况。同时，太宗还下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并在唐高宗时颁行全国。《五经正义》统一了经书的注释，让天下读书人有所依据，科举取士亦以此为统一标准。如此，儒学重归统一。李唐政权兴办官学、弘扬儒学、统一五经，最终成为大唐走向贞观、开元及天宝盛世的思想泉源。

儒学是李唐政权的核心意识形态，对青少年时期的杜甫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进雕赋表》中对玄宗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在《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中曰：“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①可见，杜甫确认其为儒学世家，这是其终生最基本的思想底蕴。

^①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5册，第2172页；卷二，第1册，第1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由此,杜甫自小对历史上著名的诤臣有深度的认同。在其晚年所作的《壮游》中便回忆曰:“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①“崔魏徒”指的是崔尚与魏启中,两人或许是杜甫祖父杜审言的朋友。以杜审言当时的名气与官场上的交往,而且其父杜闲以至于杜家还有不少人在朝为官,故文坛前辈也乐于揄扬杜甫这样既有家学渊源又确有才气的青年才俊。彼等称誉少年杜甫之才犹如东汉的班固与西汉的扬雄。班固乃杰出的史学家与辞赋家,其所撰之《汉书》,傲视千载,而其文学作品《两都赋》更是流传天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均受其影响。至于扬雄,乃西汉的大文学家,其《蜀都赋》影响了班固的《两都赋》,故张衡与左思亦皆受其影响。公元前11年正月,扬雄作《甘泉赋》讽刺成帝刘骘的铺张;十二月,复作《羽猎赋》以作劝谏,而成帝不以为逆,且封扬雄为黄门郎;公元前10年,扬雄再作《长杨赋》,继续对成帝的铺张奢侈提出批评,成帝始终宽容大度,扬雄亦锲而不舍地尽忠。崔、魏二老对青年杜甫的评点目光如炬,而杜甫念兹在兹,以班、扬自诩。后来,杜甫在诗歌上以诗为史的严谨,其长篇之汪洋闳肆,在运用史事上之精准,其对君主之讽谏以至于批判精神,确皆如班、扬。^②

二、政治理想的追求与个性的冲突

中国古代社会阶层,大体上可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管子·小匡》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③秦汉以后,随着分封制的基本废除和郡县制在全国的广泛确立,“士”的社会作用益加凸显。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确立,更是无论贫富贵贱,“士”皆得以通过科举考试,凭借其知识和才能进入朝廷,其社会作用益加重要。“士”的人生信念,主要有两条:1. 孔子所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2. 孟子所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家族层面而言,杜甫祖父杜审言虽然是颇具名气和个性的诗人,终其一生,官职品位不高,而其子杜闲即杜甫之父,也因此而远离京师成为县令。即是说,单在杜审言、杜闲的仕途趋势而言,其家族在仕途发展上已呈现没落状态。杜甫所能依靠的就是科举、杜陵家族以及其他执政或大吏的举荐。十年的奔波干谒,最后千方百计地献赋,玄宗照顾了杜甫,给予出仕,算是对其文彩的极大认可。这是杜甫毕生难忘的美好回忆,是相当难得的起点,比一般进士所获得的官位还要好。

青少年时期外界的褒扬与自我期许,令杜甫一直怀有崇高的政治理想,杜甫充分认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贞观是元龟”(《夔府书怀四十韵》)、“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并以“中兴”为理想,“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往在》)。^④ 在其《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更明确呼唤重回贞观盛世。

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他便道出其政治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⑤,即是说,他期待能敦促、协助君主实现超过尧、舜的功业,使已经败坏的社会风俗再恢复到上古那样的淳厚。

①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六,第3册,第1438页。

② 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67页,第2369页。

③ [清]戴望注:《管子校正》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21页。

④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五,第1册,第405页;卷八,第2册,第692页;卷十六,第3册,第1433页。

⑤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一,第1册,第73页。

在大历二年(767),已是衰朽之身的杜甫远在江湖,仍在《可叹》中曰:“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①这是杜甫旗帜鲜明的忠君意识与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②类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很多,陈弱水先生在《思想史中的杜甫》中便曾仔细罗列出来,更将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分作两个理念,并作出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得出的结论是:

在人生抱负的意义上,杜甫有强烈的儒家倾向;

就整体人格而言,杜甫的道家倾向并不特别强烈……他的政治社会观颇有道家余绪。^③

此论具体而令人信服。在唐代儒、释、道三家并行的时代,杜甫的思想中也有佛家的出世痕迹。然而,儒家思想仍是占据杜甫行止的主要位置,在其诗作中,“儒”字出现的次数便高达五十次之多。^④清人刘熙载评曰:“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⑤可谓的论。

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杜甫重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⑥杜甫自比稷与契,王嗣奭曰:“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原无他奇只是已溺已饥之念而已。”^⑦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⑧其《三吏》《三别》的书写是最朴素而又悲悯苍生的呈现。无疑,杜甫既有辅助君主之志,复有爱民之心,即使流落江湖,仍曰“恋主寸心明”(《柳司马至》)、“恋阙丹心破”(《散愁二首》其二)、“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⑨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饭未尝忘君”,并非指盲目忠君,即其所说的“向来忧国泪”(《谒先主庙》)^⑩,正如薛天纬先生所指出:

杜甫诗中所叙之事不是个人之事,而是国家、社会、民生之事;所抒之情不因个人遭际命运而发,而因他所系念的朝廷、民众或他人的命运而发。^⑪

他密切关注君主的所作所为,然而肃宗与代宗的政治素质,其实相当平庸。很明显,杜甫没法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存活,其期待的圣主明君模式已成为明日黄花,李唐政权已然中衰,偶尔有一两位稍清醒的皇帝,也没法在藩镇环伺与宦官把持的内忧外患中有所作为。杜甫由此而有种不遇的“孤独感”,由此他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一月后便离职,甚至后来代宗再传召他入京为京兆功曹参军,他也不赴任。他志在宰辅,不堪于在单位上屈任,他自认胸有良策应对乱世,而不甘于曲折的仕

①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十一,第4册,第1832页。

② 刘熙载的论断:“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卷2)。在今存杜诗中,共有四十四处提到“儒”字。详见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页。相关论述可参阅廖仲安:《漫谈杜诗中的忠君思想》,《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郑文:《由杜甫对唐玄宗肃宗及代宗之评论看其晚期思想有无变质》,《杜甫研究学刊》1993年第3期。

③ 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④ 赵海菱:《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6页。

⑤ [清]刘熙载著,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3页。

⑥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四,第1册,第264页。

⑦ [清]王嗣奭:《杜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5页。

⑧ 毛子水等注译:《四书今注今译》卷十四,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28页。

⑨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十一,第4册,第1824页;卷九,第2册,第774页;卷八,第2册,第692页。

⑩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五,第3册,第1355页。

⑪ 薛天纬:《唐代歌行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11页。

途。而他却没看到,与其同时期的郭子仪,战功彪炳,对李唐政权有再造之恩,却也一直备受猜疑,甚至曾被剥夺军权,而其淡然接受,在庸主与波折前,历经数朝,巍然不倒。显然,杜甫过于急于求成。

自古以来,“士”一直存在着对上层权力和精英的依附关系。然而,杜甫毕生都在个性与政治依附性中徘徊,他个性骨鲠豪迈,向往自由,然而自中年后,因为生活与传统功名观念的压迫而奔走于干谒之途。杜甫终身郁郁不得志,就连难得的出仕机会也一再自我扼杀,骨鲠的个性,令其难于从俗,不甘于卑微,乃此中官场之大忌。由此,杜甫诗中产生了如葛晓音先生所指出的“孤独感”,^①此即其《凤凰台》中的“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岁暮》中的“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②杜甫的“孤独感”固然来自其坎坷而长时间的干谒经历,更来自于未遇明主。杜甫非常羡慕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常常把二人作为“一体君臣”来吟咏。作于乾元二年(759)的《遣兴五首》其一,就是因为自己得不到肃宗的信任,才慨叹“孔明有知音”(《遣兴五首》其一),^③而自己生不逢时。《咏怀古迹五首》其四本来是咏夔州的先主庙,但末联却结以“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④王嗣奭评曰:“咏先主祠,而所以怀之,重其君臣之相契也。”^⑤诸葛亮本乃汉末“侧生”于南阳乡野,却蒙刘备三次寻访而得之,风云际会,实现三分天下的局面,而杜甫空负热望,却壮志难酬。其“怅望千秋一洒泪”(《咏怀古迹五首》其二)的不应是宋玉,而应是诸葛亮与刘备之相知。而此壮志难酬的“孤独感”,则成为杜甫后期诗歌的一种独特的风格,例如《秋兴八首》《解闷十二首》《八哀诗》以及《咏怀古迹》等名篇,充分彰显了其诗歌达至冷静与成熟的艺术境界。

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曰:“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⑥此诗旨在干谒求助,而却最终还是以桀骜不驯的姿态收结。在献《朝享太庙赋》中,他直接规劝唐玄宗力戒淫祀。^⑦在肃宗行在,他犯颜直谏不应罢免宰相房琯。在左拾遗的职位上,他曾充满希望与激情:“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北征》),“先朝纳谏诤,直气横乾坤”(《别李义》),“端拱且纳谏,和风日冲融”(《往在》)。^⑧诤臣与忠君,这种儒家思想均自于他早年被称作班固与扬雄及其自我期许的实践。黄彻《巩溪诗话》评曰:“其心广大,异乎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⑨此乃杜甫终身不改的骨鲠性格,这种个性与现实所造成的矛盾,终其一生,从没改变。杜甫对诤臣的敬仰,正是其对儒家思想的深度认同,却由此而导致其仕途的坎坷与人生的悲剧。

其在左拾遗任上的直言诤谏与弃官而去,便是个性与政治依附性的冲突。杜甫的儒家理想人

① 葛晓音:《杜甫的孤独感及其艺术提炼》,《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②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八,第2册,第691—692页;卷十二,第3册,第1068页。

③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第2册,第562页。

④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七,第4册,第1505页。

⑤ [清]王嗣奭:《杜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80页。

⑥ [唐]杜甫著,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第1册,第77页。

⑦ [唐]杜甫著,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5册,第2133页。

⑧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六,第2册,第438页;卷五,第1册,第395页;卷二十一,第1826页;卷十六,第3册,第1433页。

⑨ 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3册,第2368页。

格与现实政治格格不入。杜甫的骨鲠个性,缺乏弹性,缺乏周旋的职场认知与技巧,而战乱时期并没有机会允许杜甫直谏的宽容政治氛围。魏征在贞观年间进谏尚且几乎被太宗杀害,更何况卑微且刚入职不久的杜甫?

坚守儒家政治理想,历史上有更多的人死于诤谏以示忠于君主或朝廷。然而,杜甫所经历的玄宗、肃宗及代宗三朝君主均沉迷于道教及巫术崇拜,他们或会为颜杲卿一家数十口在朝廷生死存亡之际的就义而感动,然而绝不会欣赏一位还没有任何贡献的左拾遗的直谏。对此,杜甫绝非懵然不知,而是了解之后,依然故我。这便是儒家对“善”与“义”的坚持。故此,陈弱水先生指出:“杜甫致君辅时的愿望属于儒家最正宗的血脉。”^①目睹肃宗“谏则不行”“言则不听”,^②这应该是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而艰苦跋涉秦州,前往巴蜀的原因,此中有一种自我放逐的悲壮,犹如《论语·公冶长》中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亦即其在《晓发公安》所说的“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③

三、“腐儒”的坚守及其影响

杜甫既自觉追求儒家思想的政治理想并践行作为臣子的责任,却又以“腐儒”自称。“腐儒”是自战国末便流行的词语,意思是腐朽无用的儒生。杜甫在《题省中院壁》中曰:

掖垣竹埤梧十寻,洞门对雷常阴阴。

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

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

袞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④

这是杜甫在禁中的题壁诗,能在此敏感的政治中心自称“腐儒”,又曰“袞职曾无一字补”,可见他自己非常清楚,自救房琯而触犯肃宗之后,他基本已断送前程,空有一腔热血、满腹经纶,纵身为近臣,也是枉然。以下三次自称“腐儒”,可以理解为自己的身份或谦称,分别在《宾至》中曰:“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草堂》中曰:“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置老夫”;《寄韦有夏郎中》:“万里皇华使,为僚记腐儒。”^⑤大历三年(768),杜甫在《江汉》中最后一次宣称自己是“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与《题省中院壁》中第一次使用“腐儒”形成对话。《题省中院壁》中的“腐儒”既是感慨,也是自嘲,《江汉》中的“腐儒”更是一种悲凉的精神价值的坚持。洪亮吉《北江诗话》评曰:“杜工部之救房琯,则生平许身稷、契之一念误之。”^⑥“生平许身稷、契之一念误之”,可以说是事实,但在营救房琯一事上,杜甫确实践行了“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的期许,此即曾子所说的“临大节而不可夺”。^⑦ 尽管“腐儒”至老无成,“腐儒”虽然渺小,但是他所恪守的道是至

① 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变》,第169页。

② 毛子水等注译:《四书今注今译》卷十四,第228页。

③ 毛子水等注译:《四书今注今译》卷五,第60页;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十二,第5册,第1938页。

④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六,第1册,第441页。

⑤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九,第2册,第741页;卷十三,第3册,第1116页;卷十五,第3册,第1288页。

⑥ 洪亮吉著,陈迥冬点校:《北江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5页。

⑦ 毛子水等注译:《四书今注今译》卷八,第115页。

大无边的可以拯救乾坤的真理。《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中曰：“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中原正格斗，后会何缘由。百年赋命定，岂料沉与浮”；《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曰：“儒服弊于地”，“孔门未应弃”。而《醉时歌》曰：“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独酌成诗》则曰：“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则在反问中倾诉着一种无奈之情，表达生不逢时、所学无所用的尴尬和愤懑。其最大的感慨，亦即《奉赠李八丈判官（曠）》中所感慨的“真成穷辙鲋，或似丧家狗”；^①《舟出江陵南浦》中说的：“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此实时不我予之悲！然而，他却仍然以坚守腐儒之道而自傲，《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中曰：“甲卒身虽贵，书生固道殊”；《客居》中曰：“稷契易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②杜甫以“腐儒”自居及其坚守，这正是陈弱水先生所察觉而断定其“无疑可被视为中唐儒学复兴的先驱人物。”^③

杜甫的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在两宋知识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宋由于备受外族压迫，杜甫忠君爱国、悲悯苍生、铮铮铁骨以及其写实风格复与两宋士大夫的思想与生命情调有诸多契合。故此，自王禹偁以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文天祥、元好问、方回诸大家，及江西诗派诸子，皆先后推尊杜甫，奉其为诗学之宗主。北宋宰相王安石《子美画像》评曰：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镂。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④

王安石推崇的是杜诗之写实，更认同其忠君爱民的思想，此中的“壮颜毅色”，可见他捕捉到杜诗中杜甫儒家的伟大人格力量。南宋宰相李纲在《杜子美》一诗中曰：

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是时唐室卑，四海事戎马。爱君忧国心，愤发几悲咤。独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风》《骚》列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呜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⑤

李纲同样推崇杜诗的“干教化”“爱君忧国”，这都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且尊称杜诗“诗史”，上配“风雅”，乃“万世”之“诗人师”，实亦即尊称杜甫为“诗圣”。李纲在《校定杜工部集序》一文中更说到他读杜甫诗的体会：

子美之诗，凡一千四百四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寓于此。……时平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诵其词，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为古今绝唱也！^⑥

李纲再度肯定杜甫的“忠义气节”，揭示其诗之可贵在于“亲更兵火丧乱，诵其词，如出乎其时”

①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五，第1册，第357页；卷二十三，第5册，第2079页；卷三，第1册，第176页；卷五，第1册，第384页；卷二十三，第5册，第2021页。

②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十二，第5册，第1920页；卷二十一，第5册，第1872页；卷十四，第3册，第1255页。

③ 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变》，第202页。

④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附编，第5册，第2268页。

⑤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附编，第5册，第2273页。

⑥ [唐]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附编，第5册，第2246页。

之写实。黄彻评曰：“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得失”。^①南宋末年的宰相文天祥早年就酷爱杜诗，文集中有《读杜诗》，题跋中也常提到杜诗。在坐牢的三年间，文天祥专读杜诗，并将杜甫五言诗集成了二百首绝句，题为《集杜诗》，在《集杜诗》中自序曰：

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②

文天祥十分认同杜甫的“寓纪载之实”“抑扬褒贬”，即写实与批判，并推崇杜诗为“诗史”。杜甫《前出塞》与《后出塞五首》书写了战争的外忧与内患，而《丽人行》与《解闷十二首》则是对杨贵妃及外戚的批判，《饮中八仙歌》与《八哀诗》则是哀猛将、净臣及天才的悲歌，或为史所用，或与史吻合，全是第一手材料，被誉为“《春秋》之法”“史笔森严”。从王安石、李纲及文天祥这三位宋朝著名宰相的推崇，杜甫的忠君爱国、悲悯天下的思想备受肯定，其在诗史上的地位亦骤然拔升，基本已超越盛唐以降一直领先的李白。

由于杜甫之忧患、悲悯、耿直、忠爱，在历经丧乱，与两宋主流诗人之期待视野不谋而合。杜诗之风格多样、体兼众妙与宋型文化之“会通化成”合辙，故而成为宋诗之最高典范。^③杜甫诗集在宋代之整理、刊刻、传抄，堪称盛况空前，见于著录之杜集版本凡 129 种，总量在 1240 卷以上。^④

杜甫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在于其对前人诗歌的吸收与集大成，无论是古体乐府、抑或近体格律，都达到一定高度，故而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称：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⑤

这是对杜甫之准确而高度之评价，认为杜甫之诗集前人众家之所长，而又体会得各种诗歌体式，把杜甫在诗歌之地位推到最高位置，在此之后，秦观亦在《韩愈论》中将杜诗与韩文推崇为“集大成者”。^⑥

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曰：

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瞻博，皆出公之奇偏尔，尚轩轩然自号一家，赫世煊俗。后

① [南宋]黄彻：《巩溪诗话》卷十，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 3 册，第 2413 页。

② [南宋]文天祥：《文山全集》卷十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553 页。另可参阅吴中胜、李三梅：《诗歌若杜甫——论文天祥学杜》，《杜甫研究学刊》2000 年第 4 期。

③ 相关论述可参阅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 年，第 25—106 页。北宋诸家评述杜甫，分别可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王定国诗集叙》，《苏轼文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18 页；秦观撰，徐培均笺注：《韩愈论》，《淮海集笺注》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751—752 页；黄庭坚著，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书摩崖碑后》，《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山谷诗集注》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480 页；“山谷诗外集补”，卷四，第 1308 页。

④ 张高评：《北宋读诗诗与宋代诗学——从传播与接受之视角切入》，《汉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⑤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五十六，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601 页。

⑥ [北宋]秦观著，徐培均笺注：《淮海集》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752 页。

人师拟之不暇，矧合之乎。风骚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诗，公之余波及尔。于戏！以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颠沛寇虏，汨没蛮夷者，屯于时耶，戾于命耶，将天嗜厌代，未使斯文大振耶？虽道抑当世，而泽化后人，斯不朽矣。^①

安史之乱的冲击并没有使唐朝迅速瓦解，魏晋以来改朝换代的历史也没有重演，就是因为唐朝在一个多世纪的科举文化造就了许多像杜甫这样的儒臣之士，他们与重个体、重家族的名士传统不同，更加注重政治责任感与伦理意识，更加自觉地将个体命运与王朝兴亡联系到一起，其时的颜真卿、元结乃至许远、张巡等人就是如此，杜甫虽为微臣，其在战乱中行为与其时儒臣所展现的精神理念是一致的。^②

苏轼记过以下一段对话：

昨日见毕仲游，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气言会也。^③

杜甫“似司马迁”，这就是杜甫之“骨”，也就是其精神之所在。杜诗不止是诗，而且具备纪实性质与预言能力，故有“诗中传记手”（徐增《而庵说唐诗》）、“风雅中司马太史”（《唐宋诗醇》）之雅称。

四、余论

可以说，杜甫祖先杜预的史学与杜审言之诗学，令杜甫自小已体认了史学之严谨与诗学之批判。儒家思想的认同与坚持，诤臣道义的向往与实践，由此而形成一种悲凉的孤独感，构成杜甫后期诗歌的一种独特的风格。文史结合的潜移默化，适逢“安史之乱”的天崩地裂，遂成就了其现实关怀与政治批判，并由此而展开波澜壮阔的一代诗史。

①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百六十九，第1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07页。

② 查屏球：《微臣、人父与诗人》，《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2017年，第154页。

③ [北宋]苏轼：《荔枝似江瑶柱说》，《苏轼文集》卷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63页。